

鲁迅·周作人·胡适 浅论

张菊香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鲁迅·周作人·胡适浅论

张菊香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周作人·胡适浅论 / 张菊香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310-04932-5

I. ①鲁… II. ①张… III. ①鲁迅(1881~1936)—
人物研究②周作人(1885~1967)—人物研究③胡适(
1891~1962)—人物研究 IV. ①K825.6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85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21.125 印张 2 插页 314 千字

定价:4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代 序

《周作人年谱》序

李何林

应南开大学出版社之约，我阅读了张菊香同志主编的《周作人年谱》。这是搜集相当完备的有关周作人一生的生活和著作的编年记录，是中国第一部《周作人年谱》，记载了周作人一生的生活状况及其背景，有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活动、文学艺术思想及活动，以及他一生的著作和文章。对于他的著作和文章，凡稍有意义者都作了“提要”“题解”或“摘录”，供读者参考、研究。这个工作，编者是花了不少力气的。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有过好的和坏的影响的作家。“五四”时代（1918～1921）是他的黄金时代，当时他以一个反封建的战士形象出现于文坛，可以说与鲁迅并驾齐驱，被誉为“周氏兄弟”闻名于世。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周作人有时还发表一些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文章，但在思想感情上已经逐渐显露出赶不上进步思想界的形势了。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思想的输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和讨论，周作人原有的那一点点软弱的“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是远远落在进步思想界的后面了，被抛在马列主义思想潮流的沙滩上。

到20世纪30年代，他就越向下坡路滑去；“七七”抗战后更是越滑越远，终于做了汉奸。由此，周作人终于做了汉奸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生思想的逐渐蜕化变质导致，他的日本妻子和环境的逼迫是次要的。这一切都可以从《周作人年谱》中找到答案：他一生所写文章内容和社会政治活动实践向我们提供了答案。

其实，作为他“黄金时代”的思想也不如鲁迅思想进步：姑不论除了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种思想他没有以外，即使在对待文艺和人生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也远远不如鲁迅。鲁迅强调文学要“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周作人怎么说的呢？他说：

“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分离呢？……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自己的园地》）

他说的很明白：被称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的代表思想家的周作人，他是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因为这两者都是“把艺术分离”。艺术是“独立的”，有它的“终极”目的，这“终极”目的不言而喻是艺术本身之美。这就和当时创造社诸公的“为艺术而艺术”，说艺术的目的只在表现它本身的美，没有什么区别了。鲁迅则斩钉截铁坚定地说：文艺应该“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并且付诸于一生的创作实践。

从“五四”时代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将近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主流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但也有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影响之外，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和影响的文学，它们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上也反封建反帝，但往往反得不彻底，或者昙花一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支流。还有一些文人，在买办资产阶级思想、19世纪末没落的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现代派文艺思想、法西斯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遗毒等等的的影响下，他们反苏反共，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遗毒，粉饰或歌颂帝国主义，模仿逃避现实和反现实主义的现代派，写象征派的朦胧诗，提倡唯美主义，描写色情肉感等等，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逆流”。周作人一生主要的还是属于

支流，但“七七”抗战以后他就逐步地走向逆流中去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各种思想不断斗争中发展的，主流内部也有斗争。主流、支流和逆流，都曾用他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以及他们的创作，进行过斗争，周作人也不例外。他不止一次地反对“左翼”文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就是斗争。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有过好坏两面影响的作家，他一生走过的文学道路，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周作人年谱》现在提供了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完备，但能够查到的东西都查到了的一份资料：我翻阅了一遍这部《年谱》原稿后，真是大开眼界；它所介绍的周作人的千篇上下（未准确统计）作品，竟有十分之九是我未见过的；因而通过《年谱》我才对周作人有了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一般读者也会是这样的吧？至于用《年谱》作为线索进一步进行“周作人研究”，也会省去许多力量吧？因此特为介绍，写了这篇序。

1985年3月于北京序

《周作人年谱》(增订版)序

张中行

记得是 1998 年 2 月中旬,我收到南开大学张菊香女士一封信,说她和张铁荣先生合编的《周作人年谱》(1985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正在增订,不久之后可以完工,希望我为增订本写一篇序。这本年谱我看过,印象好,甚至有钦敬之感,原因是:一,材料丰富,可见是费了大力;二,传主是毁多于誉的人物,写他就难免沾染一些毁,未计较。初版本有李何林先生序,说了编年谱的必要性和优点,再写,像是也增加不了什么新意,当然,我也不能不想到由毁而来的难,所以未再思就先感谢而后谢绝。以为这件事就算了结,没想到不久又接到张女士信,说距最初编时已经十几年,外,境和风不尽同,而且有关材料增加不少;内,想法也应该不尽同,所以还是无妨说说,总之是还希望我写。这之后,总不少于半年吧,他们曾亲自来,谈增订的情况,并送来一部分增订稿,以便我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增订后的面貌。形势是不拿笔不行了,决定再一次知难而进。编者希望畅所欲言,就容易触及多方面,为了思路略有个条理,想大致谈四个方面:一,泛说编年谱;二,传主的人和文;三,关于弟兄对比;四,增订后的年谱。以下依次谈。

一

为周作人编年谱,推想会引来非议,我问过张女士,她说是这样。我是认为人各有所见,至少是人各有所重,别人重视编年谱,自己没有兴致看可以不看,背后说三道四就可以不必。此意还可以由积极方面说。我有时想,为了减少“逝者如斯夫”,如果可以抛开经济的原则

（费纸，读者少）不计，年谱也是多多益善。比如街头的赵老汉、巷尾的钱大妈，百年之后，有人为之编了年谱，至少是与之有关的后辈，必愿意看看。乏成就可述吗？没有成就，不惊天动地，也是一种人生，在上帝眼里，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此外是经历不平凡，对社会有小影响或大影响的，影响可以好，可以坏，可以香，可以臭，好，香，不用说，坏而臭呢？为了引为旧语的前车之鉴，新语的反面教员，也就宜于编入年谱。周作人是个经历不平凡、对社会有影响而且评价比较难的人物，说他臭也罢，香也罢，某时期臭、某时期香也罢，某方面臭、某方面香也罢，臭而兼有些香也罢，至少是为了辨别香臭，与他的作品相比，详述经历的年谱也许是更需要的吧？

二

难于评价，是因为说他多有可取，有同情汉奸之嫌；说他一文不值，而上千万字的著译俱在。我在家也守妄语之戒（为活命而随着看小红书、喊万岁例外），中学阶段读新出版的文学作品，最推重周氏弟兄的，以为受益最大（包括有什么情意能够勉强说明白），古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所以一直视他们二位为老师。大学时期出入红楼，其时鲁迅先生已不在北京，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与长寿的周作人断断续续有些来往。这就加深了谈他之难，因为除适才提到的困难之外，如果因观风而说得偏轻偏重，心里还会感到不安。上策是不说，更不写。想不到会遇见另一方面的困难。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写《负暄琐话》，其中多触及我亲历的红楼内外的旧人旧事，完稿，交老友吕冀平看，他发现没有胡适和周作人，知道是畏难，就说难也要写，我不得已，补了《胡博士》和《苦雨斋一二》。称为“一二”，是不想多说；但也不愿意违心，所以开头说他一反吕端之为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又过些年，受改革开放之风的影响，像是口和笔也可以更加开放，我应人之约，先后写了《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和钟叔河编的《周作人文选》序。写这两篇，用了钟叔河的“人归人，文归文”的原则，就是说，承认既有优又有劣，或较具体说，人，某一时期下滑，学问文章还是值得重视的，至少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再谈苦雨斋》一篇是补充《苦雨斋一二》那一篇的，就是彼时心里有而没写出来的，由交往的琐事到行藏的大节，到学问、文章的评价，都写了，所以长到超过万言书。已经说过的不想再说；但想了想，关于为人，像是还可以补充说一些。总的是他（也许可以扩大为一切人）身上具有神鬼二气，神显鬼隐。隐的，至少是有时，力量未必小。我在中学阶段，以及20世纪30年代前期出入红楼时期，主要是读他的作品，所见都是神的一面，典雅，温厚，淡泊，清高，学识、文章都是最上乘的。这种印象，不只我们年轻一代如此，老一辈，如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直到蔡元培、陈独秀等等，也是这样看。不幸是生不逢时，来了日本侵略者。古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他未能如松柏，只是霜降，就枯萎了。这情况使很多人初则大惊，继则大愤，可见他的神的一面在别人的心里植根是如何深。看看、想想别人的心境，他的枯萎就更加可惜。我出于“吾爱吾师”，在风传有附敌意之时，曾写信表示要珍惜清名。我人微言轻，奇怪的是许多旧知交，文化界的大名人，始则劝，继则声讨，他像是也听而不闻。时间不留情，几年之后就换来，先是南京老虎桥的监狱生活，后是蜷缩于八道湾旧居的后院，门外可设雀罗，外加虽无形却重如泰山的耻辱。他应该悔恨，推想也不能不悔恨，可是他不说，笔下也没有承认过。我推测，这是他的学业和文章的包袱太重，多少年曾凝聚为“知堂”或“智堂”的帽子，还缺少用自己的手摘掉的勇气。

应该承认，他的所知确是不少。语言，通中、日、英、希腊，还有世界语。读得多，写得多，专就勤说，罕见。可惜是还有失误的一面。最大的失误当然是附敌，做伪官。看《年谱》中所记，那时期，在敌伪官场上周旋，作肉麻相，说肉麻话，间或写肉麻文，想到一个曾写《谈龙集》《谈虎集》，我推重其学识、文章之人竟至这样，心里很不好过。也有些疑惑，比如就在那个时期，他还勤于读，勤于写，写他往昔惯于写的，对于其时的多种肉麻，他是怎么想的呢？在这方面，他也未能修辞立其诚，至少由推重勇于改过的人看，这就使他的失误显得更加严重。另一个严重失误是1923年7月的与鲁迅先生失和。这件事的内情，知者（张凤举、徐祖正等）不言，言者（许多外界人）不知。传闻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背后说了什么不满鲁迅先生的话，究

竟说了什么，他们夫妇不说，别人也不好问。假定是有关礼仪的，我一直认为，失误还是在周作人一面。妥善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背后之言偏于饮食，用刘伶之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偏于男女，用蔼理斯之说，情动于中乃人之常情，可不计较。可是他听了夫人的话，与提携关照他几十年、有至高成就的胞兄翻了脸。这件事制造了一个时代的黑影，蒙在许多知交以及很多文化界人士的心上。也应该蒙在他的心上，尤其是鲁迅上世纪30年代逝世、50年代他写《鲁迅的故家》等书的时候，他应该明白表示，他一时冲动，对不起鲁迅，可是他仍是不说。还有一件性质相类的小事，是上世纪40年代前期为点什么事与弟子沈启无翻了脸，用明信片的形式发“破门声明”，内情如何且不管，我总觉得近于范雎的“睚眦之怨必报”，与他曾有的典雅、温厚面貌不能调和，总之也应该算作失误。此外还有个不怎么明显的，难于定名，生活之道？生活习惯？不好说；更难于定性，好？不好？也不好说，只说现象，是维持个有书、有笔墨、有茶的“寒斋”，安坐于其中，读，写。说寒斋，也是文人的门面话，其实就是冬日，屋里仍是温暖安适的，据说，他不能耐寒，总是深秋略有寒意就生火。这是小节，但会有大影响，如30年代晚期，很多人劝他南下，他不动，舍不得书斋的安适平静也许是一个不小的原因吧？若然，这留恋安适，怕苦，总当算作他生活习惯或性格上一个大缺点，甚至称为致命伤也不为过。

以上谈人，话说了不少，是因为有些情况，我们年岁大的熟悉，年轻一代未必知道。谈文就可以不这样繁琐。不是因为有定评，是因为一，我已经谈过，没有新意；二，他的著作，近年也印了不少，味甜味苦，最好由读者自己品尝。可是有人认为，既是错误的多事，也就不值得品尝，因为人已臭，文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这是不承认可以“人归人，文归文”。我不同意，至少是不采取这种一扫光式的处理方法。单说人归人，假定生年可以满百，周作人的生活和著作还有前半生（事实是多于50岁），也一扫而光吗？实事求是，解放以后的十几年，著不少，译更多，甚至敌伪时期，在书斋内所写自以为可以编入文集的，也不当笼而统之评为毫无价值。我们应该承认人各有见，承认可以坚持自己的所见，但同时要尊重旁人的所见。这旁人，就写五

十自寿诗的时候说，包括蔡元培在内，可以扩大到全国绝大多数文化人，对于周的学识和文章，都是既欣赏又钦佩的。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不错，直到人跌了跤，专就学识和文章说，仍不错。学识，一半来于多读，一半来于多思，然后一以贯之。关于读书多而杂，就我的所见所闻说，在红楼的范围之内，他是第一位。关于由学而培养的见识，多方面，大到人生、社会，小到花木虫鱼，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要承认，他能言之成理，没有冬烘气。文章呢，就算作先入为主吧，我的感觉还是中学时期的，绍兴周氏弟兄，一位长枪大戟，或刚劲；一位细雨和风，或冲淡，至少就韵味说，没有人能赶上。现在呢，也许真就“后来居上”了，据说年轻人中，已经有看不起鲁迅的，周作人当然更不在话下。我是保守派，或如有的人所评，落后，还要加上目力不济，所读少，但胆量未缩，也就敢放肆一次说，包括看不起那二位的诸君在内，笔下的造诣离绍兴周氏弟兄的境界还相当远。单说周作人，我的想法是，人，某一时期可以唾弃，至于学识和文章，是不宜于一揽子计划扔到垃圾堆上的。

三

近些年来，著文谈鲁迅的不少，谈周作人的也有一些，也许因为一母所生，又同在南京、同往东京、同住北京，在文学界都有高名吧，谈兄，就常常触及弟，反之也一样。同时触及两位，就难免比较、评价。附敌，任伪官，鲁迅没有，这方面黑白分明，用不着费话。比，大多是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兄在上海写“惯于长夜过春时”，弟在北京写“前世出家今在家”。结论是兄有救世的抱负，而且知后即继以行，可敬；弟则没落，安于在寒斋吃苦茶，可耻。如此评断，像是是非分明，其中不再有问题。我有时想到这方面，觉得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对世事积极，或说热，不积极，或说冷，是立身处世方面的分歧。弟兄在这方面确是有分歧。分歧，既来于性格的不同，又来于学识方面的所见不同。当然都自以为是。据我所知，对于兄的由热而信，弟的由冷而疑，或说，兄的由信而热，弟的由疑而冷，双方都不以对方为然，并有争论，只是未过于表面化。两种态度，不能都对，从世风，

定了案，说兄是而弟非，我不想表示什么意见，因为内涵过于复杂，越深入想越感到拿不准。比如说，也可以设想，时间拉长，兄更高寿，入上世纪 50 年代，不能写“自由谈”式的杂感，他还那样热吗？时间再拉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许多秘密档案公开，他还费力印《引玉集》吗？这情况表示，在冷热方面对比两弟兄，是热而非冷，受推举的兄是未必永远点头的。

四

弟兄对比会有困难，更足以显示周作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为了有些人想了解他，为他编年谱就颇有意义。据《年谱》1985 年第 1 版编者“后记”，编者是接受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一种《周作人研究资料》而编成年谱的。编年谱是费力的事，尤其周作人这样的人，经历复杂而且长寿。费力则难。难之一是搜集材料，各处找，有时还要到大海里去捞针。难之二是选择，要取重舍轻。难之三是编排，要条理清楚，以求便于查考。1985 年本我大致看了一遍，觉得以上几个难题都处理得很好，这证明编者有才有学之外，还有敬业精神。也就因为有敬业精神，他们不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又费大力，增补了许多新材料，总数超过二十万字。这增订本原稿，我看了一部分，看时有个感觉，是不能看到周作人的清晰影像，比如出入红楼时期，还能看到不少其时文化界高层人士的活动情况。此外还有个优点，也值得说说，是让材料说话，编者不在旁边添油加醋，这就使读者多有自己的思考的余地。优点很多，对比之下，我的序文就很差，字数不少，大多是自己一时的胡乱想法，闭门在屋里说说可以，放在书前，附骥尾以传，纵使编者原谅，我是不能不抱愧的。

1998 年 11 月 18 日病中

今将李何林先生写的《周作人年谱·序》（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和张中行先生为这部年谱的增订本写的序文（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重刊与此，作为本书的代序。

之所以以这两篇序文为本书的代序，是因为我对这两位师长的怀念和敬重。

回想起来，我是在何林先生的指引下走上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道路的。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怀着懵懵懂懂的对文学的爱好，由工作岗位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中文系系主任即李何林先生。何林先生以其在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上的卓著成就，以其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性格和对师生们的关怀爱护，不仅在中文系受到广泛的爱戴与敬重，而且在全南开大学乃至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着良好的口碑。对于这样一位系主任，我自然是崇拜敬重有加。

大学毕业后我很意外地被保送到何林先生的门下，当了他的研究生，从而有机会更多聆听他的教导。研究生毕业后，又被留在何林先生所在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直到 1997 年何林先生被调至北京鲁迅研究室工作。此后，因工作上的联系，也从未间断过向何林先生的请教。

几十年来，何林先生以他的身教言传，对我在人生态度、治学精神上的泽被与影响，实难细数。所以当我回望此生，如果说，我在灵魂上有了些许净化、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里做出过一些小小的成绩，第一感念的，当是我的恩师李何林先生。

几十年来，我难忘何林先生在校系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那声音洪亮、观点鲜明的讲话；难忘在课堂上先生那言简意赅、深刻而透辟的讲课；难忘在知识分子最苦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先生那一丝不苟的拔草、洁厕的身影；难忘在批判先生的大会上，他那一不畏权贵、敢于捍卫真理、掷地有声的申辩；难忘他在我历次作业和论文上悉心修改的工整笔迹和每次来信中的谆谆叮咛和嘱托；更难忘在他生命的最后，在病床上，他握着我的手似有歉疚地说：“我不应该活到 80 岁以后，给别人添了太多的麻烦！”此时此刻，先生还在为别人着想！足见先生人格的纯净、高尚！

张中行先生也是我一向崇敬的前辈学者、著名作家。上世纪 90 年代末，天津人民出版社有意再版我们编写的《周作人年谱》时，首先想到的是请中行先生为这版《年谱》再作序文。因中行先生是当代

仅存的几位与周作人有过交往并在那些年撰写过一些回忆知堂文章的作者之一。且以中行先生开放的思想、渊博的知识，以及他对人对事圆融贯通、精到透彻的理解，相信先生一定会写出对周作人这一复杂人物的独到理解。况且中行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应该抢救出这份宝贵的财富。出于这些考虑，我便冒昧地给中行先生写信，请他为增订的《周作人年谱》作序。让我未敢料及的是：中行先生竟以耄耋之高龄，很快就给了我们回信，并在我们的恳请之下，慨然允诺给再版的《周作人年谱》作序，且邀约与他相见面叙。此后中行先生多次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的造访，对周作人研究以及年谱的编写提出了不少中肯而宝贵的意见。应该说在我此后的周作人研究中，中行先生也是我永志难忘的导师。

有道是“良师难遇”，我为我在从学道路上能遇到这样两位“良师”，感到无比的幸运。

今将两位导师为《周作人年谱》所写的序文作为本书的代序，以志我对他们永远的怀念，并仅以这薄薄的小册子聊做一瓣心香，忝献在已逝先辈的灵前，作为学生永久的祭奠。

学生 张菊香
2015年1月

目 录

李何林《周作人年谱 序》	1
张中行《周作人年谱》(增订版)序	1
1. 雕塑人的灵魂的伟大艺术	1
2. 鲁迅杂文的艺术风格	17
3. 浅探鲁迅杂文对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继承	32
4. 鲁迅杂文美学特征断想	45
5. 鲁迅三十年代杂文的艺术成就	55
6. 鲁迅研究上的别一洞天——喜读《籍海探珍》	61
7. 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	65
8. 从封建阶级的叛逆士到帝国主义的附庸——漫评周作人 的道路	86
9.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103
10. 周作人传略	116
11. 周作人传	123
12.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141
13. 周作人附逆原因浅探	156
14. 忧患寂寞的童年生活——周作人的童年少年时期	159
15. 南京时期的勤奋苦读——周作人的青年时代	170
16. 恰恰兄弟 成为参商——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兄弟分裂 ..	181
17. 三年的囚牢生活——周作人在老虎桥监狱	189
18. 周作人在上海迎接解放	199
19. “双百方针”照耀下的周作人	208
20. 周作人的最后日子——周作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	218
21. 红楼奠基的深情——周作人和李大钊	229
22. 从携手到分裂——周作人与陈独秀之间的交往	235

23. 周作人的一篇佚文.....	241
24. 《周作人年谱》后记（一）	246
24. 《周作人年谱》后记（二）	248
25. “周氏兄弟”与中西文化.....	252
26. 鲁迅、周作人文化心态异同论.....	269
27. 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	286
28. 概论胡适	297
29. 胡适与周作人二三事.....	317
后 记	322

1. 雕塑人的灵魂的伟大艺术

——浅谈鲁迅小说的人物塑造

“人”在生活里是中心，在艺术里也是中心。而刻画人的灵魂，又是塑造人物的中心。只要把活的灵魂贯注到所写的人物中去，人物就有了生命，就能再现出生活中“实在人物的真实性”。对人的灵魂挖掘、表现得愈深，人物性格把握得也就愈准确，艺术形象也就愈丰满、深厚、感人。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创作，之所以摄人心魄，莫不是因为它们深刻地挖掘和艺术地再现了人的灵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他还称赞托尔斯泰，说：“认识人的心灵，乃是托尔斯泰伯爵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别林斯基谈到艺术品不同于肖像时，也曾指出：艺术品“不仅抓住外部的相似，并且还把握住原物的整个灵魂”。

中国的传统艺术，更加强调传神，更加注重艺术创作在“形似”基础上的“神似”。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曾经详细地论述过艺术创作所以强调“神似”的原因，指出：“不曰形，曰貌，而曰神者，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能相同者矣。作者若但求之形似，则方园肥瘦，即数十人之中，且有相似者矣。乌得谓之传神？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鬚髭而后多髯，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而视之，必恍然曰，此即某某也，盖形变而神不变也。故形或小失，犹之可也，若神少乘，则竟非其人矣。”中国传统的戏曲、绘画、小说作者，都得力于“传神”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众多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艺术名作。